

地方品质与城市创业活跃度： 影响机制与空间差异

张超 李倩 何红丽

内容提要：创业活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创业区位和人才区位内生于地方品质，而地方品质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本文构建了包含地方政府政务服务、营商环境、包容性等维度的地方品质指标体系，选取2017—2021年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作用的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具有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品质建设通过吸引人才集聚、增强城市社会信用水平、扩大市场需求、提高知识溢出效率等途径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其他城市，地方品质对行政等级较低城市、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未来旨在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地方品质政策应当聚焦于提升品质多维度建设的系统性、品质驱动机制激活的精准性、品质建设的地理空间适配性和品质动态监测评估体系的科学性，为推动创业环境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关键词：地方品质 城市创业活跃度 人才集聚 社会信用 市场需求 知识溢出 城市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9.21;F279.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5)12-0092-16

一、问题提出

创业活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其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或地区发展质量和竞争力^[1]。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提升创业质量，成为中国应对当前挑战的关键所在^[2]。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旨在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活动中。然而，创业过程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潜在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和创业成功率往往受到创业环境的深刻影响。当前各地创业环境仍面临着诸如区域发展不平

收稿日期：2025-06-17；修回日期：2025-1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人才集聚视角下空间品质驱动城市创新的机制与对策研究”（23FJYB028）；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河北营商环境政策效应与优化调整对策研究”（ZD202512）

作者简介：张超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401；

李倩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何红丽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衡、创业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创业文化氛围相对薄弱、对创业失败的包容度不高等问题,如何通过优化地方创业环境有效激发潜在创业者的创业热情、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释放创业活动的就业拉动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空间分布与流动正在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人才是创新创业的主体,人才的区位选择决定创新创业的空间布局。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指出,对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意思维的人才而言,其区位选择本质上是地方品质驱动的,即区域繁荣、创新创业的空间布局和人才的区位选择内生于地方品质^[3]。那些具有更优越的城市自然环境、更丰富的艺术文化设施、更多样化的户外活动场所以及更开放包容的社区环境的地区,更能够吸引和集聚高技能人才并激发其创新创业热情。地方品质驱动地区创新创业,而地区创新创业活力的提升又通过反哺地方财政收入、优化城市服务供给、助力城市治理水平提升、营造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等途径带动地方品质。伴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纵深推进,地方政府竞争范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地方品质—人才集聚—创新创业活力”这一逻辑链条进一步强化^[4]。传统的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土地让利为核心的要素低成本竞争范式正在逐步转变为以“地方品质”建设为核心的新型竞争范式。竞争重心也逐步从“招商引资”转向“招才引智”,地方政府角色定位也从单纯的优惠政策提供者转变为一流营商环境和卓越城市治理的营造者。202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新理念,强调城市发展应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地方品质建设在新时期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地方品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探讨了个体特征、制度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维度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具体而言,学者们重点关注创业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营商环境、产权保护、文化多样性等制度因素,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等硬件因素对创业决策的影响^[5-7],而较少探讨地方品质因素与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内在关系。既有关于地方品质的区域经济效应的研究更多聚焦于人才流动、城市创新、劳动力溢价支付意愿等方面^[8-9],对其影响创业活动的机制与空间差异的分析相对不足。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以 2017—2021 年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系统检验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地方品质是否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第二,地方品质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第三,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差异和异质性特征?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在地方品质指标体系构建上,纳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和政府服务等维度,凸显了地方政府在地方品质建设中的重要性;(2)从人才集聚、社会信用、市场需求、知识溢出四个角度系统揭示地方品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3)从城市特征角度深入分析地方品质影响效应的空间差异和异质性,为不同类型城市制定差异化的地方品质建设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创业活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个体特征、基础设施、正式制度环境^[10-12]和非正式制度环境^[13]四个维度展开。个体特征维度方面,相关研究分别探讨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婚姻、社会资本等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性别刻板印象给女性创业带来诸多障碍,而对男性创业活动则有促进作用^[14]。兄弟姐妹对男性的创业活动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女性创业活动则产生不利影响^[15]。已婚女性尤其是有成年子女的女性表现出更强的创业倾向^[16]。基础设施维度方面,高铁开通可以通过增强

连通性为创业者提供便捷的面对面交流机会,有助于促进知识和信息的交流互动,缓解信息不对称,帮助潜在创业者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和提高创业能力^[17]。正式制度环境维度方面,以商事制度改革为重要内容的政务环境的优化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来激发潜在创业者的创业热情^[18]。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成果的合理性和独占性提供法律保障,从而有效保证企业研发过程、创新成果和商业活动不被竞争者模仿^[19]。非正式制度维度方面,文化融合通过增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感、拓宽人际关系网络、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金支持等途径提高流动人口的创业意愿^[20]。社会信用通过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加快信息传递以及保障契约有效执行等途径稳定创业主体的心理预期,从而缓解信贷资源对创业活动的制约^[21]。

地方品质的概念源自佛罗里达(Florida, 2002)的创意资本理论^[22],其内涵包括地方自然和建成环境、便利的生活服务、多元人群及包容性的文化氛围等。而在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地方品质被明确定义为城市不可移动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多样性和质量的总和^[23]。既有研究大多从消费服务、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地方品质进行测度^[24-27]。在城市容忍度或包容性测度方面,佛罗里达(2002)基于人才、技术、宽容(“3T”)理论^[28],并采用波希米亚指数、文化熔炉(移民)指数等来反映城市对多元主体的开放和接纳程度^[29-30]。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李叶妍和王锐(2017)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两个方面来测度城市包容性,强调制度层面的包容性建设^[31]。而周颖刚等(2020)进一步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城市吸引力三个维度构建包容性测度体系来反映城市对不同群体的包容能力和吸引力^[32]。伴随地方品质概念和测度的不断成熟,学者们开始关注地方品质的经济效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地方品质对劳动力尤其是人才流动^[33-36]、区域创新^[8-9,25]、地区溢价支付意愿^[37-38]等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且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纵观以上既有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地方品质测度上相对忽视地方政府在地方品质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有研究更多将地方品质视为城市自然禀赋和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而相对忽视政府治理能力、营商环境、政务服务等“软件”要素的重要性。现实中,地方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在公共服务供给、城市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包容文化氛围培育等地方品质建设的诸多方面,地方政府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地方品质与创业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机制,即优质的政府治理和地方品质驱动创业,创业活跃度提升又通过反哺财政收入、推动政府服务优化、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等途径促进地方品质改善。因此,在地方品质指标体系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对地方政府政务服务、营商环境建设、城市治理效能的考量。其次,现实中不同城市已经开始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地区创业的影响,也积极出台人才引进、城市更新、文化建设等若干相关政策,但目前仍缺乏对两者关系的实证探讨,亟待通过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来填补这一不足。最后,现有研究相对忽视了地方品质影响效应的空间差异。鉴于中国城市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地理位置、行政等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很可能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深入剖析地方品质创业效应的异质性将有助于为不同类型城市制定差异化的地方品质建设策略和创业促进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地方品质影响创业活动的直接效应

城市为潜在创业者营造创业环境的优劣程度会直接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和创业成功概率。就潜在创业者的创业决策而言,他们在一个城市能够获得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政务环境、市场环境等

因素的创业环境的满足感时,往往会更倾向于选择开展创业活动,以实现更好的职业发展和提高生活满意度。而较高的地方品质意味着较优的创业环境,有丰富的私人消费服务、完善的公共服务、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高效的政务服务。从创业条件来看,创业活动是一项兼具高风险和高需求的活动,创业成本、创业资源以及创业机会是影响潜在创业者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而地方品质所体现出的良好的创业环境,不仅能够降低潜在创业者面临的各类成本和风险,还能够提供多元化的要素资源,亦能够提供丰富的创业机会,使潜在创业者能够增强其对未来收益的信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更多的创业行为并提高创业成功概率。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正向影响。

(二) 地方品质影响创业活动的作用机制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地方品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研究主要涉及人才集聚、社会信用、市场需求、知识溢出四个方面。

第一,地方品质通过促进人才向本地集聚,为创业活动提供人力资本,进而推动创业活动的开展。

依据创新学派的创业理论,人才被视为创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他们扮演着推动当地生产要素及条件重新组合的创新角色。因此,人才的数量对创业活动的繁荣程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人才具备较强的认知能力和市场洞察力,能够提出具有技术性、前瞻性的创业想法,在商机的识别与价值捕获方面展现出优势,从而能够实现相对更高的创业收益,这直接驱动他们具有更为积极的创业态度和更高的创业意愿。人才在城市的集聚还影响着创业活动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具有不同行业背景的人才共同构成共享劳动力池,这有助于借助信息传播与交流,发挥学习效应,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技能与素质,为初创企业提供所需的劳动力^[39-40]。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业活动也从依赖传统要素、资本驱动的模式逐渐转变为依赖知识和创意推动。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的崛起对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呈现出更高的要求,只有具备高技能水平的人力资本,才能实现与这些新经济发展需求的精准匹配和深度融合。人才的集聚可以使企业更容易找到所需的特定劳动力,从而提高初创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匹配质量。总之,人才在城市的集聚不仅能增加劳动力群体的创新创业知识存量,还可以扩充创业人才、精英员工队伍^[41]。

地方品质对人才集聚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人才对地方品质具有更强的感知能力和评判标准,地方品质的建设将率先作用于人才的区位选择行为。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完整家庭迁移模式”成为主流家庭迁移模式,人才家庭方面的保障尤其是子女教育显得至关重要。良好的教育环境也被视为当地人力资本积累的初始优势。同时,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增强,人才对城市高水平医疗服务的需求逐渐突出。另外,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蓝绿色空间等自然环境不仅可以让人感到舒适,使人愉悦,还可以有效减轻人们的压力和焦虑,促进心理健康,提高幸福感。因此,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宜居的生态环境都是影响人才“用脚投票”的重要因素^[35]。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地方品质能够通过促进人才集聚来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

第二,地方品质通过影响社会信用,为创业活动积累信贷资源和信息资源,进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

社会信用作为一种保障,可以通过激活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信任纽带和协作潜能,有效促进各方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风险,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激发创业者的涌现。社会信用可以通过为创业活动积累所需的信贷资源和信息资源来提升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在积累信贷资源上,社会信用可以通过提

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来降低初创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交易成本,增大创业者获得创业资金的可得性,为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提高创业绩效。此外,社会信用能够通过良好的沟通氛围和信息环境的营造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稳定投资者和潜在创业者的心理预期,增强他们的投资信心和创业信心,进而吸引更多的风险资本投资于本城市的创业活动中^[21]。在积累信息资源上,社会信用的提高可以促进社会网络的形成,社会网络丰富性的增加有助于创业者积累创业所需的信贷资源和信息资源,提高创业的可能性和创业的意愿。

地方品质对社会信用有着重要的影响。完善的交通设施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促进相互间的信息共享,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城市整体的社会信任水平^[42]。数字化浪潮背景下,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经日益成为开展创业活动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开放性数据资源的可获得性可以为潜在创业者提供更为完善的市场信息获取渠道,使其能够准确识别和把握市场需求、行业趋势和消费者行为,建立起以数据为支撑的精准决策体系。这种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有助于初创企业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营策略的动态优化,从而提高其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优势,进而为初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推动力。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着信息传递和获取的方式,促使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共享成为可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中,创业者能够便捷地获取多元化、实时性的信息,这可以减少传统商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消除市场参与者之间因信息落差而产生的不信任感。同时,高效、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 and 市场化、法治化以及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能够增加市场主体间的社会信任,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地方品质可以通过提高城市的社会信用水平来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

第三,地方品质通过增加市场需求,为创业活动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从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

市场要素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地的市场需求,影响着创新创业活动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规模。对创业者来说,他们可能偏爱更大的需求市场,因为这意味着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更多的创业机会,这也将激励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创新创业。市场规模反映着当地的总体需求容量和消费潜力,较大的市场规模通过提供更充分的经济承载空间,为潜在创业者识别市场机会和获取资金支持提供有利条件。此外,不同领域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也将为创业者的创业活动提供更广泛的选择空间,从而增强创业者从事创新创业活动的意愿和信心。

地方品质可以通过刺激市场需求推动创业活动的开展。首先,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为扩大市场提供便利。无论是高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还是宽带网络的普及,都可以一定程度上打破地域限制,最大限度地扩展本地市场的边界,帮助创业者更有效地开拓新市场和新产品。其次,包容性的氛围可以吸引多样化的人群,从而刺激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创造更大的市场需求。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口往往会对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这为创业者提供多样化的尚未开发的市场机会,尤其是零售行业或服务行业^[43]。同时,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也能增加本地消费者的选择,从而提高当地总体消费需求水平,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机会。最后,地方品质较高的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电影院、咖啡厅等消费场所,优化消费环境,从而为创业活动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地方品质能够为市场带来大量的新机会,进而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创业领域。

第四,地方品质通过提高知识溢出效率,为传播创业知识提供渠道,进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

创业知识溢出理论认为,由于新知识商业化过程中固有的高风险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现有企业受限于多种因素,通常难以对其所拥有的全部知识进行商业化,致使部分有价值的知识没有充分利用,这意味着

市场上存在着潜在的创业机会,而这些潜在的创业机会能够促进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活动^[44]。

地方品质对知识溢出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包容性强的城市具有较低的进入壁垒^[8],这将有利于广泛汇聚人才^[43],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多元知识的交流,从而产生新知识。有外国学者研究发现,艺术网络充当着新思想传播和跨企业和行业知识转移的渠道^[29]。此外,包容性强的城市具有更为开放的态度和较低的试错成本,不仅能有效激励人们进行新知识的探索,还能鼓励人们将失败经历内化为经验积累(隐性知识资本),这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知识溢出效率。另一方面,休闲文化场所可以为基于非契约式的面对面交流和拓展办公活动提供可能。知识型人才追求人、文化、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偏好能增强活力、鼓励社会互动的各种场景。而高品质的城市拥有较多的咖啡馆、酒吧和餐馆,这可以为他们提供非正式的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和空间。创业者可以不受正式场合的约束,自由地分享经验,这有助于打破彼此间的隔阂,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5:地方品质能够通过增加新知识的溢出来提高新企业创建的可能性。

四、实证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通过对数据进行筛选整理,本文最终选取 2017—2021 年中国 28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地方品质指标、控制变量及新注册企业数量主要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中国裁判文书网、天眼查网站。部分缺失值采用省、市、县级统计局数据或使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齐。

(二) 模型设定

为分析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Entre_Act_{it} = \alpha + \gamma Quality_{it} + X'_{it}\beta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Entre_Act_{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 i 在年份 t 的城市创业活跃度。 $Quality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城市 i 在年份 t 的地方品质指数。 X'_{it} 表示控制变量向量, μ_i 和 λ_t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α 、 γ 、 β 为对应的待估参数。

为检验地方品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机制,借鉴江艇(2022)^[45]的做法,本文设定如下模型以检验地方品质是否对人才集聚、社会信用、市场需求、知识溢出有促进作用:

$$Inter_Var_{i,t} = \alpha + \gamma Quality_{i,t} + X'_{i,t}\beta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Inter_Var_{i,t}$ 为机制变量,分别采用人才集聚($Talents$)、社会信用($Trust$)、市场需求($Demand$)和知识溢出($Knowledge$)变量进行替换,其余变量与式(1)含义相同。若回归系数 γ 显著为正,则说明相关机制是存在且有效的。

(三)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城市创业活跃度($Entre_Act$)

作为衡量当地创业活动相对水平的重要指标,学者们主要采用创业率来测度城市创业活跃度,即将新创企业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目前,标准化处理的方式有三种:劳动力市场法、生态学研究法和人口法。劳动力市场法仅将城市中 15~64 岁劳动力人口作为标准化基数,但尚未统计地级市层面的劳动力人口数量;生态学研究法仅将城市已有企业数量作为标准化基数,尚未考虑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影响,这往往带来一定

的测量偏误^[2]。而人口法则将城市中人口规模作为标准化基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上述问题。因此,本文参考白俊红等(2022)^[41]的研究,以人口法进行新创企业数量的标准化处理,即以城市每百人新创企业数量作为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测度指标。

2. 核心解释变量:地方品质指数(*Quality*)

本文借鉴杨开忠等(2021)^[23]、张超等(2022)^[26]、刘威等(2025)^[46]关于地方品质指标体系的构建方式,并加入佛罗里达(2002)^[28]“3T”理论中的包容性这一重要维度,构建涵盖休闲文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包容性五个维度的地方品质基础指标体系。同时,传统地方品质指标体系往往假定地方品质是外生的、禀赋性的,但现阶段地方品质建设的诸多方面,如公共服务供给、包容文化氛围培育等,均与地方政府区域治理息息相关,尤其与政务服务及营商环境营造密切相关。地方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地方政府在地方品质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在指标设计中加入政务服务、营商环境建设维度。本文最终构建了包含休闲文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包容性、政务服务、营商环境七个维度的地方品质指标体系,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不同指标体系的权重,测算得出中国2017—2021年286个城市的地方品质指数。

其中,休闲文化维度由公园数量、每百人拥有图书数量两个指标测度,体现城市文化娱乐设施的丰富程度;公共服务维度涵盖教育和医疗服务指标,即小学生均教师数量、每万人拥有床位数量,反映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础设施维度由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指标来衡量城市硬件设施完善程度;生态环境维度则从气候条件、空气质量、绿化水平等方面评价城市宜居性;包容性维度由户口指数和青年亚文化百度搜索指数来衡量城市的包容性水平;政务服务维度选取政府关怀度^①、财政治理水平、公众参与^②三个指标,以反映城市政府治理水平及多元协同治理能力;营商环境维度选取市场化指数、万人刑事案件、外资企业占比三个指标,以反映城市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水平。具体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

在包容性维度指标选取上,参考佛罗里达等(Florida et al., 2012)^[30]关于包容性的定义,即城市对小众群体的开放态度,从两个方面进行测度,即户口指数和青年亚文化百度搜索指数。首先,在中国相对严格的户籍制度背景下,当城市外来人口占比较高时,意味着外来人口融入城市较容易,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程度高。其次,既有研究常用文化熔炉(移民)指数、波希米亚指数等指数来测度异质友好性。帕克和伯吉斯(Park & Burgess, 1925)认为,充满活力的城市为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异类文化提供了温床,亚文化群体得以形成身份认同,并逐渐融入城市生活^[47]。佛罗里达等(2002)进一步指出,波希米亚指数(衡量艺术人口如艺术家、音乐家、作家、演员的比例)是衡量文化和创意生产者的直接指标,不仅能反映活跃的艺术和文化环境,也代表着城市的开放、任人唯贤、容忍风险的价值观念^[22]。本文借鉴波希米亚指数的衡量方式,参考奥德兹等(Audretsch et al., 2021)^[48]的研究,将青年亚文化作为包容性的又一代表变量。异质友好性是对偏离日常行为标准的“非传统”的特征、行为或价值观等异质要素的包容和平等对待^[49],而青年亚文化恰恰体现了这种“非传统”特征。青年亚文化作为当代前卫亚文化的代表,其多样性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流文化对异类文化的开放包容态度^[50]。在青年亚文化测度上,本文创新性地选择青年亚文化的特定关键词词条的年搜索量表征,有关青年亚文化的特定关键词词条的选取步骤为:首

① 指地方领导对企业的关心和服务程度,以领导人(市委书记、市长)到企业视察次数和领导人(市委书记、市长)与企业家座谈次数来测度。

② 公众参与是指社会力量参与城市事务的程度,以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数占期末从业总人数的比重来测度。

先,根据其定义、特征以及现有研究,初步选取二次元作为原始关键词;其次,利用百度指数的图谱扩充关键词的相关词,如动漫、哔哩哔哩(B 站)等关键词;再次,确定关键词的大致范围,过滤掉无关、搜索量较小的关键词;最终,确定追星族、直播、电竞、电竞俱乐部、B 站、弹幕、二次元、动漫、ACG(动画、漫画、游戏)文化九个关键词作为测度指标。百度指数能够反映一段时间内通过百度网页或百度新闻对某个关键词的搜索量趋势,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体现出该城市居民对与该关键词相关内容的兴趣程度和关注程度。城市居民对某些亚文化内容的关注程度不仅反映了个人偏好,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城市文化环境对这些“非主流”文化的接纳程度。同时,城市居民对某些内容的关注程度也将引发城市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关注。当一个城市的青年亚文化搜索量较高时,说明该城市对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表达具有较高的包容度,为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群体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空间。这在成都、长沙、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等城市已经得到了证明。

表 1 地方品质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属性
休闲文化	公园数量/个	正向指标
	每百人拥有图书数量(册/百人)	正向指标
公共服务	小学生均教师数量/人	正向指标
	每万人拥有床位数量(张/万人)	正向指标
基础设施	每万人出租汽车数量(辆/万人)	正向指标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人)	正向指标
	每万人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户/万人)	正向指标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户/万人)	正向指标
生态环境	1 月平均气温/℃	正向指标
	细颗粒物(PM _{2.5})年平均浓度(ug/m ³)	负向指标
包容性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指标
	户口指数	正向指标
	青年亚文化百度搜索指数	正向指标
政务服务	政府关怀度	正向指标
	财政治理水平	正向指标
	公众参与/%	正向指标
营商环境	市场化指数	正向指标
	万人刑事案件(件/万人)	负向指标
	外资企业占比/%	正向指标

3. 机制变量

本文选择能够反映人才集聚效应、社会信用效应、市场需求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变量对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第一,选用高技能行业从业人员占比来衡量城市中的人才集聚水平,即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之和占城市总从业人员的比重。第二,采用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作为社会信任水平的衡量指标。第三,鉴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使用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市场需求,以人口数量为标准基数可以更准确地衡量

市场需求在单位意义上的变化,减少总量值造成的规模偏误。第四,采用城市的研发支出(R&D)来衡量知识溢出效应。

4.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其他地级市层面的重要变量。金融支持(*Finance*):创业资金的充裕程度与金融支持相关,这不仅影响潜在创业者的资金来源渠道和融资约束程度,还影响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的运行效果,进而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信心及创业意愿。因此,本文选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城市的金融支持。人口密度(*Density*):潜在的市场规模和创业资源与人口密度有关,这不仅影响潜在市场的开发成本和风险,还影响资源获取的便利性,从而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因此,本文选用年末常住人口与行政土地面积之比来衡量城市的人口密度。工资水平(*Wage*):工资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市场状况有关,这可能会影响潜在创业者的机会成本,也可能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市场环境,从而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决策。因此,本文选用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城市的工资水平。失业率(*Une*):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与就业机会的稀缺性有关,这可能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热情。因此,本文选用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总的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重来衡量城市的失业率。

(四) 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城市创业活跃度在样本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最大值为20.2365,最小值则为0.4370;地方品质在样本中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最大值为3.6752,最小值则为-0.6779;这为探究两者间的关系及有关作用机制提供了研究契机。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观测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i>Entre_Act</i>	1 430	1.288 9	1.461 2	0.437 0	20.236 5
解释变量	<i>Quality</i>	1 430	-0.150 1	0.542 1	-0.677 9	3.675 2
控制变量	<i>Finance</i>	1 430	1.039 8	0.626 9	0.388 0	5.304 7
	<i>Density</i>	1 430	366	353.374 6	6	2 636
	<i>Wage</i>	1 430	74 760	18 256.902 2	38 713	201 504
	<i>Une</i>	1 430	0.048 4	0.045 3	0.004 1	0.775 3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地方品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基准回归结果。加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可以更好地识别地方品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结果表明,*Quality*的回归系数为0.2837,并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方品质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果验证了假设1。良好的地方品质意味着更密集的人才和技术以及市场信息资源、更完善的法治环境、更高效的政府服务、更健全的金融体系,这不仅可以降低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减少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还可以催生出更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为潜在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Quality	0.981 7*** (0.079 2)	0.283 7** (0.143 6)
Finance	0.212 8*** (0.059 3)	-0.295 0 (0.328 4)
Des	0.000 7*** (0.000 1)	-0.006 0*** (0.002 3)
Wage	0.000 0*** (0.00 0)	0.000 0** (0.000 0)
Une	0.002 5*** (0.000 8)	0.001 3*** (0.000 1)
常数项	0.429 4** (0.178 4)	3.446 2*** (0.937 5)
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430	1 430
R ²	0.329 2	0.111 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后表同。

表 4 内生性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Quality		0.256 1*** (0.101 3)
IV	0.418 4*** (0.144 1)	
Kleibergen-Paap rk LM	7.067 8 [0.000 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30.144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430	1 430

注：[]内为*P*值。

(二) 内生性分析

为应对内生性偏误,本文运用工具变量估计策略以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城市所在省域内其他地级市地方品质指数平均值作为该城市地方品质的工具变量(IV),内生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第一阶段的IV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工具变量和地方品质存在一定的关联。第二阶段的Quality的回归系数为0.256 1,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基准回归结果具有可靠性。

(三) 稳健性检验

为增加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1)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尝试选用未经标准化处理的新注册企业数量替换被解释变量,以此来衡量城市创业活跃度。(2)缩尾处理。为避免异常值对地方品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基准回归结果造成偏误,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的双边缩尾处理。(3)为获得更一般化的结论,本文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市四个直辖市从样本中剔除,以便更准确地评估模型对其他样本城市的适用性,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遍性和适用性。上述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5)均显示,地方品质的改善能够有效地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

表 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新注册企业数量	缩尾	剔除直辖市
Quality	0.001 9*** (0.000 3)	0.283 7** (0.143 6)	0.363 2** (0.158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430	1 430	1 410
R ²	0.763 5	0.111 2	0.112 1

(四) 机制分析

1. 人才集聚效应(*Talents*)

人才的示范效应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和资本进入城市,进一步推动城市中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由表6可知, *Talents* 对 *Quality* 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方品质能够促进人才集聚。而且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人才集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促进作用^[41]。这是因为人才集聚往往意味着大规模的熟练劳动力、高人力资本与风险投资基金等要素的汇聚,为创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各种保障。上述结果支持了假设2,即地方品质可以通过人才集聚来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2. 社会信用效应(*Trust*)

由表6可知, *Trust* 对 *Quality* 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方品质能够促进社会信任。同时,现有研究已表明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有助于增强创业者的创业能力^[21]。这是因为社会信任的提高可以促进潜在创业者之间的信息共享,从而可以促进他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进而对获取商业机会信息和获取创业资源有着重要作用。社会信任的提高还可以吸引外部投资,为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缓解融资困难的问题,从而释放城市的创业活力。上述结果证实了假设3,即地方品质可以通过增加社会信用,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3. 市场需求效应(*Demand*)

由表6可知, *Demand* 对 *Quality* 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方品质能够刺激市场需求,扩大市场规模。地方品质可以为居民消费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消费场所,由此带来的消费需求可以释放大量的市场空白,为创业者提供更加广阔的创业市场。而且,已有研究表明刺激市场需求有助于增强潜在创业者的意愿和信心。这是因为市场需求空间的扩大可以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同时市场需求规模效应可以降低进入门槛,提高创业活动预期收益。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4,即地方品质可以通过增加市场需求,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促进作用。

表6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i>Talents</i>	<i>Trust</i>	<i>Demand</i>	<i>Knowledge</i>
<i>Quality</i>	0.387 3 *** (0.143 4)	0.377 2 *** (0.130 5)	0.665 8 *** (0.200 7)	1.024 4 * (0.539 5)
常数项	0.464 2 *** (0.217 5)	0.739 2 *** (0.131 3)	0.768 3 ** (0.297 6)	0.237 5 (0.888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430	1 430	1 430	1 430
<i>R</i> ²	0.151 2	0.212 3	0.185 8	0.096 9

4. 知识溢出效应(*Knowledge*)

由表6可知, *Knowledge* 对 *Quality* 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方品质对知识溢出具有

正向影响。良好的地方品质能够为知识溢出提供机会,而知识的溢出能够增加潜在创业者的知识存量,使创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潜在创业者可以利用这些新知识创建新企业。因此,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 5,即地方品质可以通过知识溢出来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五) 异质性分析

1. 行政等级

相较于一般的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城市通常是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先行者,在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41]。

为检验该异质性特征,本文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定义为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其他城市定义为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在行政等级较高的重点城市样本中, *Quality* 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样本中, *Quality* 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地方品质未对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有影响,而对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创业活跃度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完善程度、创业要素资源集聚及政策倾斜力度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使地方品质对其创业活跃度的边际贡献遵循递减规律。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已充分享有知识溢出、劳动力池、专业化分工等集聚外部性,当超过最优城市规模时,拥挤成本将抵消地方品质改善的边际收益。同时,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存在多种发展路径和资源获取渠道,对地方品质改善的依赖程度较低。相比之下,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在上述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这使得地方品质提升对其创业活跃度的边际效应更为明显。当这些城市通过改善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等方式提升地方品质时,能够迅速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有效吸引投资和人才流入,激活本地创业潜能。

表 7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行政等级较高城市	行政等级较低城市
<i>Quality</i>	1. 217 4 (0. 840 2)	0. 260 6 ** (0. 116 0)
常数项	11. 239 2 *** (2. 055 2)	-0. 297 6 (1. 822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5	1 255
<i>R</i> ²	0. 292 9	0. 099 9

2. 地理位置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分布和经济规模的分界线,东南侧和西北侧具有显著的差异。相较于西北侧的城市,东南侧的城市人口众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为检验该异质性特征,本文将依据胡焕庸线划分西北侧和东南侧城市,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表 8 的回归结果表明,地方品质未对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有影响,而地方品质

对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有正向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东南侧城市大多沿海,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拥有良好的创业环境,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而西北侧城市受地理条件限制,在基础设施、要素流动、市场规模等方面相对处于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品质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

3. 资源禀赋

资源禀赋情况往往影响着城市的资源可获得性、产业专业化基础以及经济发展方式。为检验该异质性特征,根据国务院关于资源型城市的划分标准,本文划分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以进行异质性城市样

表 8 城市地理位置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西北侧城市	东南侧城市
<i>Quality</i>	-0.058 4 (0.153 4)	0.296 0* (0.168 9)
常数项	0.408 5 (1.777 4)	3.105 7*** (0.956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5	1 295
<i>R</i> ²	0.285 1	0.117 3

表 9 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i>Quality</i>	0.368 1* (0.212 3)	0.319 2 (0.212 2)
常数项	0.065 7 (1.866 3)	4.763 8*** (1.022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75	855
<i>R</i> ²	0.080 6	0.163 0

本分析,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9 所示。

在资源型城市中, *Quality* 的回归系数为 0.368 1,且在 10%水平下显著为正。在非资源型城市中, *Quality* 的回归系数为 0.319 2,但不显著。这意味着,地方品质对资源型城市创业活跃度有促进作用,而尚未对非资源型城市创业活跃度有影响。这是因为资源型城市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开发来促进城市发展,往往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压力大及政策相对滞后等问题,而地方品质的改善能够通过优化政务服务、改善营商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等途径来实现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有效弥补资源型城市在创业环境方面的劣势,从而释放新的创业潜能。相比之下,非资源型城市通常拥有更为多元化和均衡的发展基础,地方品质的边际改善空间较为有限,其对创业活跃度的增量贡献趋于递减,因而统计上难以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7—2021 年中国 28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休闲文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包容性、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七个维度的地方品质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品质建设可以通过吸引人才集聚、增强城市社会信用水平、扩大市场需求和提高知识溢出效率四个机制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其他城市,地方品质对行政等级较低城市、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有促进作用,这表明地方品质建设可以有效弥补欠发达地区在创业资源、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不足,帮助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发展。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构建系统性地方品质提升战略,提升品质多维度建设的系统性。具体而言,一是应优先发展教育和医疗服务,加大对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设施的投入,为创业者及其家庭提供优质的教育医疗保障;二是应完善基础设施网络,重点加强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内外连通性,为创业活动提供便利的要素流动条件;三是应营造包容性环境,建立健全外来人口服务体系,降低户籍门槛,培育多元文化氛围,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才集聚;四是应强化政务服务效能和营商环境建设,提高政府治理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同时加强法治建设,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二,精准激活地方品质的创业促进机制。基于机制分析结果,应针对性地激活人才集聚、社会信用、

市场需求、知识溢出四个传导渠道。在人才集聚方面,制定差异化的人才政策,通过住房补贴、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综合性保障措施,提高地方品质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人才在不同主体间的流动;在社会信用方面,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发展普惠金融,创新信贷产品,缓解创业企业融资约束;在市场需求方面,培育多元化消费市场,支持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完善消费基础设施,优化消费环境,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在知识溢出方面,建设各类型的创新创业平台和孵化器,支持举办行业论坛、技术交流会等活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提高知识溢出效率。同时,应建立健全有利于增加知识溢出广度和深度的多元化休闲文化交流平台和创意空间建设,构建多层次的交流合作网络,增进彼此间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和频率,推动创新思维的碰撞融合,从而更好地发挥地方品质的知识溢出功能。

第三,充分考虑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异质性影响,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地方品质建设策略。基于异质性分析结果,应对不同类型城市实施分类指导。对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应加大地方品质建设投入,重点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建立对口帮扶机制;而对于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应发挥地方品质优势,打造创业创新高地,而西北侧城市应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发展特色产业;对于资源型城市,应抓住转型发展机遇,利用地方品质建设推动产业多元化,而非资源型城市应通过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进一步提升创业环境质量。

第四,建立地方品质考核机制和动态监测系统。将地方品质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价范围,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品质建设的资金支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各维度地方品质建设。同时,建立地方品质动态监测系统,定期评估政策效果,建立创业活跃度跟踪机制,及时调整政策措施,加强政策实施的督查督办,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此外,应总结地方品质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建立城市间交流合作机制,促进最佳实践经验的传播扩散。

参考文献:

- [1] 张萃. 什么使城市更有利于创业? [J]. 经济研究, 2018, 53(4): 151-166.
- [2] 叶文平, 李新春, 陈强远. 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机制与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8, 53(6): 157-170.
- [3] 杨开忠. 以地方品质为关键推动未来城市建设 [J]. 群言, 2019(8): 4-6.
- [4] 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5] AUDRETSCH D B, BELITSKI M.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in cities: establishing the framework conditions [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7, 42(5): 1030-1051.
- [6] 万海远. 城市社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创业带动作用 [J]. 经济研究, 2021, 56(9): 39-55.
- [7] GLAESER E L, KERR W R. Local industrial condi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how much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an we explain? [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09, 18(3): 623-663.
- [8] 张超, 肖植检, 兰宗敏. 包容性、人才迁移与城市创新 [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 42(4): 217-228.
- [9] 赵儒煜, 高明宇, 李亚雄. 空间品质如何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J]. 财经科学, 2022(11): 123-137.
- [10] 谭伟杰, 胡润哲. “智”巢何以引凤: 智慧城市建设对地区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 45(1): 75-93.
- [11] 徐晔, 王志超.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创业活跃度——基于负面清单的证据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5, 46(8): 3-18.
- [12] 董晓波, 何昌磊. 电子商务发展能否提升城市创业活力? ——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 [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5, 27(1): 67-84.
- [13] 张明斗, 张镜. 城市品牌建设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准自然实验 [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4, 26(5): 47-63.

- [14] 张慧, 韩梦薇, 刘德文, 等. 性别刻板印象与女性创业活动: 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5, 47(8): 102-118.
- [15] 米旭明. 兄弟姐妹有利于创业吗? ——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南开经济研究, 2022(8): 158-175.
- [16] 李后建, 郭安达. 农村独生子女会更倾向于创业吗? [J]. 南开经济研究, 2021(6): 234-252.
- [17] 孔令池, 张智. 基础设施升级能够促进企业家精神成长吗? ——来自高铁开通和智慧城市建设的证据[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 42(10): 139-152.
- [18] 邓峰, 吴小羽. 商事制度改革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机制研究[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1, 23(6): 15-25.
- [19] 陈东.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溢出与创业活跃度——基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J]. 西部论坛, 2023, 33(3): 64-81.
- [20] 周战强, 蒋晓敏, 韩冰清. 文化融合与流动人口城市创业[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9): 58-65.
- [21] 孙晋云, 白俊红, 张艺璇. 社会信用与城市创业活跃度[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 45(3): 75-93.
- [22] FLORIDA R. Bohemia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2, 2(1): 55-71.
- [23] 杨开忠, 顾芸, 董亚宁. 空间品质、人才区位与人力资本增长——基于新空间经济学[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1, 41(12): 3065-3078.
- [24] 杨开忠, 范博凯, 董亚宁. 空间品质、创新活力与中国城市生产率[J]. 经济管理, 2022, 44(1): 47-64.
- [25] 李婷, 陈健生. 地方品质、人力资本积累与城市经济增长[J]. 南开经济研究, 2024(2): 25-42.
- [26] 张超, 陈思, 兰宗敏. 地方品质与区域创新: 直接影响、溢出效应与空间差异[J]. 中国软科学, 2022(7): 82-93.
- [27] 李少鹏, 顾芸, 杨开忠. 空间品质对创业型流动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影响[J]. 财经科学, 2023(11): 93-104.
- [28] FLORIDA R.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 92(4): 743-755.
- [29] FLORIDA R, MELLANDER C, STOLARICK K. Inside the black box of regional development—human capital, the creative class and tolera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8(5): 615-649.
- [30] FLORIDA R, MELLANDER C, QIAN H F, et al. China's development disconnect[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012, 44(3): 628-648.
- [31] 李叶妍, 王锐. 中国城市包容度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1): 146-154.
- [32] 周刚毅, 蒙莉娜, 林雪萍. 城市包容性与劳动力的创业选择——基于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J]. 财贸经济, 2020, 41(1): 129-144.
- [33] 杨开忠.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逻辑: 地方品质驱动型发展[J]. 经济与管理, 2019, 33(1): 1-3.
- [34] 马骏, 沈坤荣.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市发展质量提升: 目标、挑战与路径[J]. 宏观质量研究, 2023, 11(5): 59-72.
- [35] 张超, 陈思. 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 CLDS 2016 的实证分析[J]. 南方人口, 2021, 36(1): 1-16.
- [36] 杨开忠, 刘威, 董亚宁, 等. 基于空间品质的经济地理核心——边缘模型研究[J]. 地理学报, 2024, 79(10): 2442-2459.
- [37] 张超, 王君慧, 姚永玲. 通勤成本、地方品质竞争与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化[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 24(5): 58-72.
- [38] 刘威, 董亚宁, 李方, 等. 空间品质与区域价格水平——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的分析[J]. 经济地理, 2025, 45(3): 1-11.
- [39] 杨开忠, 刘威, 董亚宁, 等. 区域经济发展新逻辑: 纳入旅行成本的新空间经济学[J]. 世界经济, 2024, 47(1): 30-56.
- [40] 张萃. 外来人力资本、文化多样性与中国城市创新[J]. 世界经济, 2019, 42(11): 172-192.
- [41] 白俊红, 张艺璇, 卞元超. 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6): 61-78.
- [42] 张维迎, 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 2002(10): 59-70.
- [43] QIAN H F. Diversity versus tolerance: the social drive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US cities[J]. Urban Studies, 2013, 50(13): 2718-2735.
- [44] AUDRETSCH D B, FELDMAN M P.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2004, 4: 2713-2739.
- [45]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 [46] 刘威, 杨开忠, 董亚宁, 等. 知识溢出对空间经济的影响机理——一个新空间经济学模型[J]. 经济学动态, 2025(4): 106-125.
- [47] PARK R E, BURGESS E W. The ci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 [48] AUDRETSCH D B, LEHMANN E E, SEITZ N. Amenities, subcultures, and entrepre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1, 56(2): 571-591.
- [49] 周密, 张颖昕. 城市包容性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J]. 城市与环境研究, 2021(3): 77-92.
- [50] 马中红. 青年亚文化: 文化关系网中的一条鱼[J]. 青年探索, 2016(1): 74-83.

Quality of Place and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Influence Mechanism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ZHANG Chao, LI Qian, HE Hongli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vital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it not only helps address employment challenges but also strengthens economic vitality. In the context of a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entrepreneurship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driver for China's economy.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xert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entrepreneurship. Therefore, addressing how to optimize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to enhance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has become a pressing issue. Innovation drive is essentially talent drive, and talent drive is essentially quality of place drive. Therefore, a good quality of place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6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1, this paper adopt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construct a quality of place indicator system from seven dimensions of leisure culture, public service, infrastructu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clusiveness,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applies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quality of place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quality of pla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e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quality of place operates through four channels: talent agglomeration, social credit, market demand,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quality of place is more pronounced in cities with lower administrative ranks, those located southeast of the Hu Huanyong Line, and resource-based citie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three ways. First, it includes the dimension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uality of place indicator system,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such construction. Second, it explores the role of quality of place in influencing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rough four channels. Third, it analyzes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quality of place through the lens of city characteristics, which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ities to formulate tailored strategies for the quality of plac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lace and enhance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us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Specifically,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establish systematic,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place; develop targeted mechanisms that activate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he quality of place;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for the quality of plac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dynamic monitoring systems for the quality of place development.

Keywords: quality of place;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alent agglomeration; social credit; market demand; knowledge spillover; urban governance

责任编辑:宛恬伊;姚望春